

媒体框架效应中的民众国家安全观

——以经贸安全为议题的实验研究*

候为刚

内容提要：为考察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与态度的现状及成因，文章以中美经贸摩擦这一重要的经贸安全事务为议题材料，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法，来探讨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如何影响中国民众对经贸安全的认知与应对态度，并运用追踪调查法来揭示这种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性。根据亲中—亲美基本立场的差异，文章设计出亲中、亲美、竞争以及自由讨论四项基本的媒体框架类型。研究发现，亲中框架、竞争框架与讨论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观的作用都是单一维度的，即只在态度主张或认知维度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被试在认知和态度两个维度上均未受即时的亲美框架信息的刺激。这表明，在长期受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人们的安全认知模式和态度较为稳定，并适应于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文章试图综合媒体监管等结构性动因与微观认知心理机制，来解释上述差异现象。最后，就未来如何理解国际竞争格局中一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如何对全民展开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做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媒体框架 经贸安全观 认知维度 态度维度 实验研究

作者简介：候为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安全战略思维，国家安全观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受众心理机制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2AZZ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感谢马得勇、陆屹洲、黄敏璇、陆铭等师友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国所处的安全局势的认知模式和信念体系。了解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是现代民主国家制定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必要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系中，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和挑战也达到新的高度。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给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浏览各种媒体信息俨然成为民众了解和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渠道。不同属性的媒体对于国家安全事务的报道信息，会对受众的主观安全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不仅受个体内在的心理特质的影响，还受到外在的媒体框架的刺激，即框架效应。对此，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媒体信息框架如何影响受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及应对态度？这种影响是否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考察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在不同媒体框架下是否存在差异，主要基于如下理论或现实的考虑：首先，受众既有的价值信念体系多大程度上会受其所接触的媒体信息内容的塑造？对此，传播学界存在“魔弹论”“有限效果论”等争论，这为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特殊的信念体系提供了理论空间。其次，宏观的制度与微观的认知基础联系密切。型塑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的信息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逻辑是什么？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宏观体制因素与微观心理机制进行有效融合。最后，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及演变的微观心理机制，有助于完善当前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实践的引导策略，以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更准确地掌握他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动向。

二、理论与议题

（一）国家安全观：概念与形成路径

既有研究倾向于将国家安全观视为国家对自身所处环境没有威胁的客观状态的主观感知，涉及对威胁的来源、安全保护对象、维护安全的手段等问题的系统性思考。^①少数学者主张应从认知、态度评价及预期三个层次入手分析国家安全观。^②这些研究强调国家行为体对一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安全态

^① 杨光海：《安全观的演进：从传统到非传统的转变》，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第72~80页。

^②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 当代亚太

势的主观感知，具有鲜明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然而，作为行动和结果的前提，观念在终极意义上由个人而非集体所萌发和持有。^① 组织层面的观念往往是个体观念的“集合”。为此，本文将国家安全观视为民众对一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安全态势的认知与应对态度，即从事实认知和态度立场两个维度来理解民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所形成的观念体系（即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其中，认知层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的识别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选择何种维护国家安全策略的态度立场。这样，我们对国家安全观的概念界定，便与既有侧重探讨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做法区别开来。不过，普通民众与政党和国家等组织行为体的国家安全观联系密切，其中，权力规训、从众心理等多种机制发挥着“联结”作用。

目前关于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演变路径的探讨，同样侧重从国家行为体的视角展开。尹继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模式后发现，二元对立的西式民主思维追求绝对安全，而强调包容共存（多元一体）的东方文化则秉持相对安全的理念。^② 这表明，认知模式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微观基础。还有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亚太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呈现一种变迁历程。^③ 与此前的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各项传统安全要素的统筹，具有丰富的系统性思维。^④ 然而，从国家行为体角度探讨国家安全观的演变逻辑，更多聚焦于理论阐释，而缺乏经验的实证检验。还有研究讨论了国家安全观如何引导一国设置对外战略议程，指出国家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其应对策略偏好。^⑤ 例如，莫迪政府对中方的安全战略认知会左右其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⑥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国家行为体或政治精英的国家安全观及其后果，却

① 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33~59页。

② 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151~158页。

③ 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第3~29页。

④ 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3~25页。

⑤ 邢戎：《走近盟友：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未来走向探析》，载《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8~155页。

⑥ 候为刚：《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41~62页。

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尽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尝试为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提供思辨性分析,^① 但这类论述仍未能厘清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机理。

(二) 媒体框架与民众国家安全观

观念的演变往往离不开人们对外部情境的感知, 而以框架化为底色的媒体信息则成为联结个体内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态势判断的关键机制。

1. 媒体框架效应: 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新视角

媒体框架是指通过电视等具体信息源来框定某议题与哪些事项有关, 进而影响受众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过程,^② 这包括受众对该议题给予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提供应对方案等基本环节。^③ 框架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与框架自身特性、受众心理特性以及框架发生的具体情境这三类要素有关。^④ 框架效应与议程设置理论密切相关, 议程是特定精英或媒体所框定的对象或内容, 而要理解塑造受众政治态度的框架效应机理, 则需在具体的议程中加以考察。^⑤ 鉴于此, 本文结合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和微观心理机制, 为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提供媒体框架效应的解释。

在新媒体时代, 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别人加工过的“二手材料”, 并据此来认识世界。这种“拟态环境”表明, 人们往往无意识地将脑中的图景当作真实的外部世界。^⑥ 显然, 媒体框架并非简单地生产、传递信息, 而是会在形式和内容上直接影响人的认知和态度。扎勒 (John R. Zaller) 认为, 人们政治态度的形成或变化往往是在其接触什么样的信息,

^① 曹晓飞:《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 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2期, 第125~129页。

^② 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 “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2007, pp. 103-126.

^③ Robert Entman,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 1993, pp. 51-58.

^④ 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载《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第57~69页。

^⑤ 西方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框架效应做了更简要的解释。宏观上, 框架效应强调新闻行业者如何使用表达方式, 以使受众头脑里既有的“图像/图式”(schema)与所传递的信息产生共鸣, 微观上则旨在凸显受众在识别某一议题的认知心理机制。参见 Dietram Scheufele and David Tewk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7, No. 1, 2007, pp. 9-20.

^⑥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 常江、肖寒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4、14页。

□ 当代亚太

以及对信息的解读过程中完成的。^① 对此，卡尔斯特（Manuel Castells）直接将信息视为权力。^② 近年来，型塑民众政治态度的媒体框架效应，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一项新近的实验研究表明，亲中框架表现出强大且持久的框架效应，亲美框架则表现出“逆火”效应。^③ 在面临复杂的议题时，现实舆论中的多种媒体框架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国内民众对美国的敌视态度。^④ 另有实验研究从侧面验证，长期接触境外媒体信息的受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一度下降。^⑤ 这表明，长期接触不同属性的媒体信息，受众的政治态度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理解国家安全观这一具体的信念体系在不同媒体框架中的现状，提供了必要的启发。

2. 认知心理机制：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微观基础

社会认知研究旨在揭示外在信息刺激态度反应这一“黑箱”过程。西蒙（Herbert A. Simon）从信息加工和生理反应两个过程考察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模式。^⑥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基础认知模式、锚定效应（或图式理论）等具体机制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

首先，关于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基础认知模式。人们处理信息的思维系统可以分为系统1—系统2两种基本类型，^⑦ 对于影响受众的威胁感知与策略选择的框架效应机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曾基于不同方案的表述形式如何影响人们对某疾病治疗方案的选择，做了一项经典实验，发现表述方式的差异影响了受众的策略选择。^⑧ 这表明，个体对某项风险的威胁感知及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框架类型的影响。

① 约翰·扎勒：《公共舆论》，陈心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9页。

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与传播力》，曹书乐等译，载《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74~92页。

③ 陆屹洲、马得勇：《媒体框架效应及其持续性——以中美经贸摩擦为议题的实验研究》，载《新闻大学》2020年第11期，第50~65页。

④ 马得勇、陆屹洲：《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第99~120页。

⑤ Yuyu Chen and David Yang, “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1984 or Brave New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9, No. 6, 2019, pp. 2294-2332.

⑥ 赫伯特·西蒙：《认知：人行为背后的思维与智能》，荆其诚、张厚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⑦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⑧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 211, No. 4481, 1981, pp. 453-458.

其次，以锚定效应为基础的信息处理心理机制，为理解国家安全观的媒体框架效应提供了解释。根据参照对象（即“锚”）的时间方位不同，可将锚定思维分为历史记忆（即“古”为“今”锚）、诱发定势（即以当前的关注点为“锚”）以及愿望思维（以对未来的预期为“锚”）等更具体的心理机制。^① 由于个体在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总是有限的，因而倾向于通过具体的心理机制来处理信息，与既有信念体系保持一致，以缓解因认知失调而产生的焦虑感。^② 一项研究将信息“先占优势”理论放在中国舆论情境中加以检验后发现，个体接收其脑中率先搜寻到的信息后，后续行为很大程度上受该信息的影响，且不会轻易改变先前的信念。^③ 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公众在获取关于本国利益受损或安全受到威胁的信息时，往往会表现出愤怒情绪的民族主义现象。类似地，图式理论或启发法（如隐喻思维）可作为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具体认知模式。“图式”将既有经验信息组织起来，在新的情境下提供与之相关的认知结构（如过滤剩余信息，或补充缺失信息），进而帮助人们迅速做出判断。^④ 启发法作为一种认知捷径，在处理复杂信息时较为便捷，但也会产生诸多消极后果。例如，根据即时联想或启动的信息做出决策，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容易忽视与既有信念体系不一致的信息，从而产生认知上的偏误。^⑤ 当人们缺乏相应的理性认知能力，则倾向于借助图式、隐喻等机制来处理复杂的政治信息，并据此来判断、应对外部局势的变化。

3. 时间性：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变化

与政治家相比，普通民众处理国家间利益纠纷这类复杂性议题往往更困难。一方面，由于该群体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因而更倾向于根据既有的认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43页。

^② Leon Festinger, “Cognitive Dissonance”,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07, No. 4, 1962, pp. 93-106.

^③ 马得勇：《理性至上抑或立场先行？——中国网民的信息认知能力与舆论态度》，载《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2020年第6期，第51~67页。

^④ Susan Fiske and Linville Patricia, “What does the Schema Concept Buy U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6, No. 4, 1980, pp. 543-557;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and Feldman Stanley, “How People Organize the Political World: A Schematic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1, 1984, pp. 95-126.

^⑤ Lau Richard and David Redlawsk,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5, No. 4, 2001, pp. 951-971.

□ 当代亚太

知模式来处理这类议题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训练，普通民众难以形成更为系统的认知与信念体系。^① 考虑到学界对政治态度是否稳定存在争议，有必要考察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具体的政治观念是否随时间变化而持续变化。由于人们所处情境的复杂多变，并随着阅历的积累，个体在不同时段对同一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可能不同。换言之，相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在不同时段对民众国家安全观或许存在不同的影响。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与思考

学界围绕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及形成逻辑展开了初步的探讨，为我们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提供了启发性思考，但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围绕国家安全观的既有研究没有赋予普通民众应有的价值关怀，现代民主体制的设计原则意味着，一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而对国家安全观的探讨，最终需回到民众层面。无论从观念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从合法性角度看，“把民众带回来”是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应有之义。二是在理论范式上，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缺乏认知心理等微观理论的支撑和实证方法的检视。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人们所接触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加工的“二手”信息，因而生产、传播信息的各种媒体无疑会影响到受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及态度反应。那么，在接触不同类型的媒体框架信息后，受众的心理机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国家安全观？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论证和经验层面的解释。对此，我们借鉴学界关于人们处理复杂政治信息的一般认知模式或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并由此展开下一步的研究设计工作。

三、研究设计

政治传播和政治心理领域围绕型塑受众基础政治态度的框架效应做了大量尝试，或许能为解码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媒体框架效应机理提供有益的启发。

（一）民众国家安全观：分析框架与假设

本文主要聚焦两个问题：一是探讨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二是这种差异是否具备明显的时间延续性？与西方

^① Phillip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Apter ed., *Ideology and Its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p. 206-261.

国家舆论环境不同，当前中国的舆论环境表现为官媒主导，各种社交媒体接受官方指导，且各类官方组织逐渐入驻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国内舆论同质化程度呈逐渐增强的态势。综合国内舆情现状和既有研究成果，我们或许可以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路径做这样的描述——特定安全问题的出现，获得行为体的注意，由此设置相应的议程→媒体报道会刺激受众的安全感知（即启动人们识别威胁信息的认知模式）→受众尝试通过寻找其他信息等方式来削弱威胁感，以保持与既有的信念体系的一致→最终呈现某种系统化的安全思维（即安全观）。那么，当受众接触某类媒体框架信息时（如强调战略竞争，或凸显双边合作），是倾向于表现出“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强硬型安全观，还是更注重理性分析，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温和型安全观？本文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形成以下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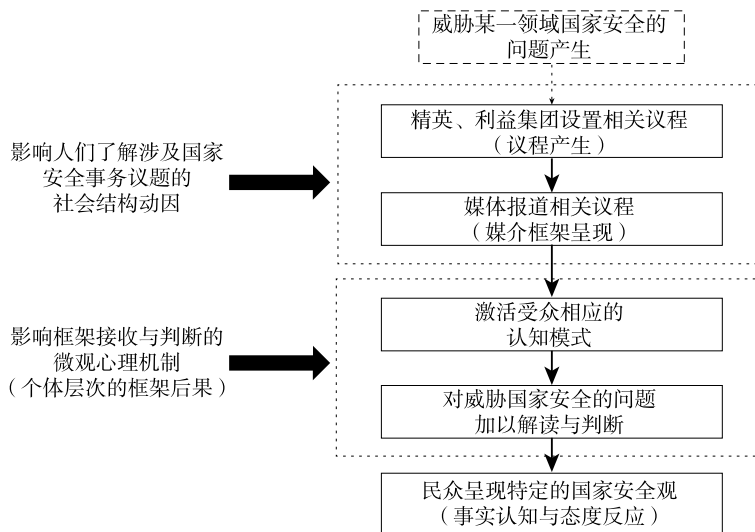


图 1 民众国家安全观型塑的媒体框架效应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前期理论化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在作用方向和程度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

假设 2：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作用效果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减弱，不太可能具备明显的时间持续性。

□ 当代亚太

（二）议题选择与研究对象

国家安全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屏障。在全球化时代，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项基础性议题，经贸安全一定程度上统筹了安全与发展的两大基本面向；201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发起对华贸易制裁，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民众（尤其是在首都等特大城市高校的大学生群体）或多或少会接收到与贸易战有关的信息，或涉及对该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民众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对该议题的了解可能不够深入，而这恰好为媒体框架发挥作用提供了场域。通过揭示民众对于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和应对态度，文章试图勾勒出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状况。

关于本研究的实验材料选取，我们以2018年3月美国实施对华贸易制裁为议题，梳理中国官方围绕该议题的舆论回应的两种基本立场：一是“亲中”型，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作为反击，激活民族主义情绪；二是“亲美”型，注重用事实和证据凸显中方的贡献，强调贸易争端的本质是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误读，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经典材料如《环球时报》推送的图文《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这笔账》。^① 后者这类温和、平衡的舆论更加注重对中美贸易战进行反思和理性分析，将贸易战的根源视为意识形态分歧（文明的冲突），认为中国需深化改革，顶住压力。简言之，面对同一事件，中国官媒先后表现出“亲中”“亲美”两种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

关于媒体框架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已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实验对象，来考察中国民众经贸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主要是因为：一是心理机制的基础性。青年大学生接触何种媒体信息后的国家安全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或预测其他群体接触相应的媒体框架信息后的安全认知与态度状况。二是该群体的重要性。青年大学生群体作为新媒体时代的“弄潮儿”，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对各类媒体的使用更加频繁。同时，作为未来国家安全事业建设的主力军，该群体的国家安全观关系到今后国家安全战略和事业发展的前景。三是由于研究经费的

^① 《环球时报》于2018年4月7日在第7版发表了《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这篇评论。随后，《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7月10日推送了《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这笔账》这篇图文。为研究便利，我们结合上述报道内容提取核心论点和论据，并以相似的篇幅和排版生成实验材料。

限制，以大学生国家安全观作为分析对象更具备研究上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三）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实验实施

在实验准备阶段，我们于2018年11月公开招募了6名实验助理和123名被试，他们均是来自北京某重点高校的本、硕、博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根据参与实验的时间长短，我们以每人80~100元（人民币）不等的金额支付被试的酬劳。本文通过以群体为测试单位的分组比较及前后比较，来探讨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变化逻辑。在呈现特定框架之前，我们先测试受众关于贸易战的具体认知与态度，即T0时刻的经贸安全观。随后，通过随机化分组来控制或稀释个体特质的差异可能对结果造成的解释偏差。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通过以群体为观测单位的分组和“前测—后测”的比较，来揭示被试的政治态度。^①这样一来，通过随机化分组，我们只需关注关键性变量（或施加的刺激）是否会对被试群体产生预期的效果即可。为考察T1时刻被试的经贸安全观，实验分为四组：第一组（亲中组）被试者只阅读亲中立场的材料，然后回答问题；第二组（亲美组）被试者只阅读亲美立场的材料，随后回答问题；第三组（竞争组）被试者同时阅读亲中、亲美的材料，然后回答问题；第四组（自由讨论组）不仅同时阅读两类材料，还进行适当的讨论，再回答问题，这是为了探究在不同属性的竞争框架信息的情境中，被试能否通过充分的讨论来减少政治立场的对立，寻求共识。其中，前三组每组的实验进行时间约30分钟，最后一组由于添加了讨论环节，实验进行时间约45分钟。实验开始前，主试先说明实验注意事项，并要求实验助理在实验过程中避免干涉被试的讨论或回答，以尽量减少外部压力对被试答题的影响。

为了解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实验结束一个多月后（2018年12月底），我们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参加上述实验的被试展开追踪调查（主要通过微信或短信的方式与被试取得联系），获取了有效问卷106份，再次测试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状况和应对态度（即T2时刻的经贸安全观）。追踪调查仍遵循此前实验室实验的随机化分组原则，这样，便将在T1~T2时刻这一个多月里可能影响被试经贸安全观的各类因素（如生活环境、他人观点等）“随机”化或稀释了，进而观察一

^① Allyson Holbrook and James Druckman, “Attitude Change Experi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James Druckman, Greene Donald, James Kuklinski and Lupia Arthur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41-154.

□ 当代亚太

个月前的实验刺激效果是否仍持续增强或削弱。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一个月里并没有发生影响人们认知或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的重大事件。这表明，在此环节可能干扰结论的各项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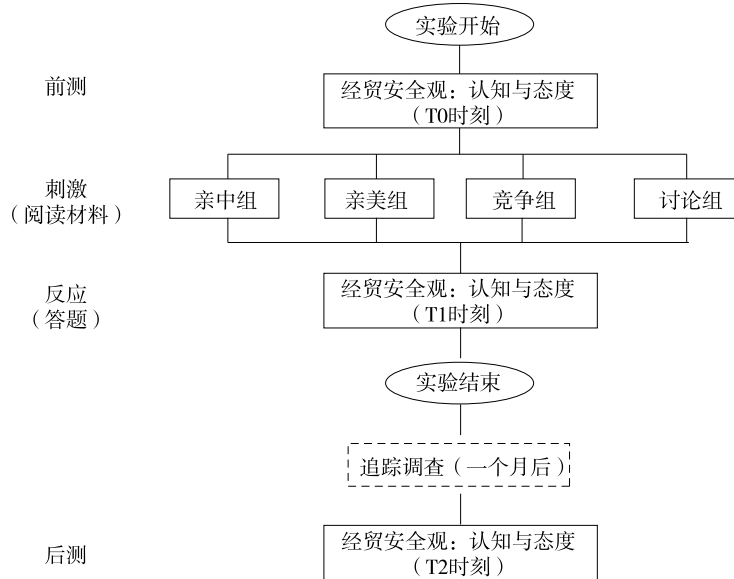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生经贸安全观的实验操作流程

资料来源：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学生实验数据，该实验流程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设计并主导，在此表示感谢

(四) 经贸安全观的概念测量

本文将经贸安全观视为民众对一国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以及采取何种策略来维护经贸安全的立场态度的思维体系。考察民众的经贸安全观，可通过不同媒体框架下民众对经贸安全的事实认知这一维度的差异和变化，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这一维度的差异和变化两个层面得以体现。

首先，关于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事实认知（即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民众对关于经贸安全事实的认知差异及变化，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个体所受何种类型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该指标的问题设置从正反两个向度分别表述为，“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完全是美国挑起的，中国没有错”“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此前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承诺”。这两个问题分别从亲中、亲美两个基本立场，考察被试对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核心议题

的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状况。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T0时刻）、实验过程中（T1时刻）以及实验结束后一个月的追踪调查（T2时刻），我们均要求被试对上述两个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做出回答。^①

其次，关于维护经贸安全策略的立场主张（即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在特定媒体框架的信息刺激下，受众的经贸安全观这一具体的政治态度是否具有差异，以及是否随时间变化，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该指标的问题设置分别表述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决不妥协”“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在贸易战问题上中国有必要向美国做出适当的妥协和承诺”。与上述指标一致，这两个问题分别从亲中、亲美基本立场考察被试对维护经贸安全的策略主张或态度立场。同样地，我们在T0、T1、T2时刻分别要求被试对这两个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做出回答。^②

此外，被试的背景信息主要包括：年龄（原始记录）、性别（女=0，男=1）、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其他=0）、社会满意度（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政治兴趣（不太感兴趣=1，一般=2，比较感兴趣=3，很感兴趣=4）、对贸易战的关注程度（完全没听说=1，不太关注=2，比较关注=3，非常关注=4）。这些变量有必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分析过程，以控制先天条件可能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观所造成的干扰。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能够描绘主要变量的基本分布状况，在随机化分组后，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各组）变量的均值信息如表1所示。其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这类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满意度、政治兴趣、对贸易战的关注度等社会态度变量的均值在各组间的分布较为均匀（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在

^① 这两个问题的原始问卷的选项均设置为：1=强烈同意，2=同意，3=中立（不知道），4=反对，5=强烈反对。为方便数据分析，本文将赋值倒过来而对该变量重新编码，这样，数值越大，表示同意程度越高（即越认为错在美方）。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Cronbach）系数是0.6299，根据学界通常采用的做法（克隆巴赫系数在0.6~0.8之间，表示信度较好），表明该指标测量的信度较好。

^② 对经贸安全的态度维度的操作方式同上，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系数是0.6199，表明该指标测量的信度较好。

□ 当代亚太

各组间的分布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被试的平均年龄接近 23 岁, 学习阶段以硕士生为主, 且多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样本分布比较符合该校的实际情况。总体而言, 经随机化分组后, 我们对上述人口学变量和基础社会态度变量实现了较好的控制, 可以为后续的分析做准备。

表 1 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下变量的均值分布状况

组别 \ 变量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社会满意度	政治兴趣
亲中框架 (n=26)	0.46	23.08	0.46	3.62	2.65
亲美框架 (n=29)	0.45	22.55	0.34	3.83	2.52
竞争框架 (n=27)	0.41	22.67	0.48	3.59	2.56
讨论框架 (n=24)	0.38	23.42	0.42	3.36	2.38
全部样本 (N=106)	0.42	22.91	0.42	3.63	2.53
方差分析	0.93	0.72	0.75	0.33	0.73

说明: 均值取小数点后两位, 小写字母 n 为每组的样本量, 大写字母 N 为总样本量
资料来源: 同图 2

(二) 回归结果呈现

在呈现各组间变量的均值分布状况后, 本文将分别描述被试对经贸安全观的事实认知、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这两个维度在各媒体框架中的差异及变化。在图 3、图 4 中, 中心点为均值, 竖线为 95% 的置信区间。

1. 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

在考察不同类型媒体框架下民众的经贸安全观是否存在差异前, 笔者先对随机化分组及实验前测 (T0 时刻) 的测量效果进行检验,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T0 时刻的测量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在阅读实验材料前 (即未接受相关媒体框架信息的刺激), 不同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p 值为 0.6835)。随机化分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不同媒体框架下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 即四组被试在经贸安全认知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其中, 亲中框架 (亲中组) 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在接受实验刺激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p > 0.1$),^①

^① 关于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是否显著地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的检验方法为配对样本 t 检验, *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p 值表示媒体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是否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后面关于被试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是否显著地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的检验方法与此相同。

即被试浏览亲中框架信息后，并没有对自身的安全认知模式产生显著的影响。亲美框架（亲美组）与竞争框架（竞争组）的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在实验过程中均经历了上升趋势（即趋于认为贸易战完全由美方挑起），但这一变化过程并不显著（ p 值分别为 0.2062, 0.5417）。这或许反映了长期生活在舆论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下，人们的安全认知模式较为稳固。与前三组框架效果完全相反的是，讨论框架（竞争+自由讨论组）对被试经贸安全的认知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即接触该框架信息后，被试愈加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方挑起（ p 值为 0.01）。这一结果表明，当处在自由讨论环境下时，人们更倾向于表现出更加温和的、进行自我反思的认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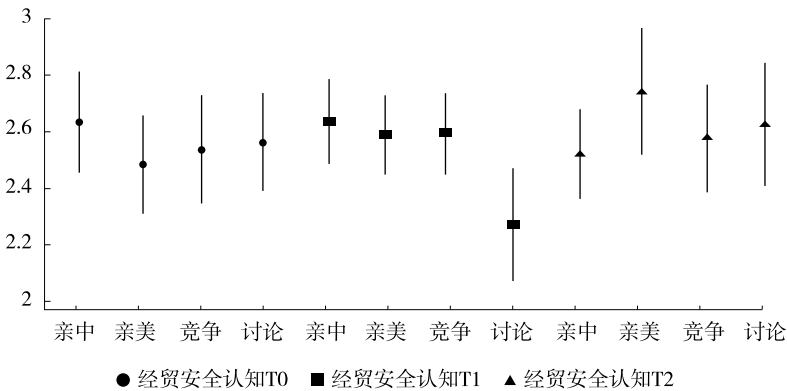


图 3 各组被试在不同时段关于经贸安全的认知变化状况

说明：纵轴数字表示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 2

由图 3 直观可见，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媒体框架效应总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时间持续变化特征。一个月后，亲中框架（亲中组）被试的安全认知表现为趋于温和、理性的判断模式（即认为中方应适当反思），但这一变化趋势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p 值为 0.16）。亲中框架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的影响较为稳定。这或许是由于长期生活在舆论同质化程度较高，且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背景下，该群体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更不容易受到即时的亲中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相比之下，单独出现的亲美框架尽管在实验中并未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一个月之后（T2 时刻）

□ 当代亚太

出现了边缘显著的上升趋势,^① 即更加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方挑起。换言之, 亲美框架信息对被试安全认知模式的影响, 经历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表现为 T1、T2 时刻被试的认知模式均趋于强硬, 但 T1 时刻的增强趋势并不显著)。类似地, 竞争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即向实验前的认知水平靠拢, 但这一影响过程并不显著(p 值为 0.8516)。竞争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 经历了先上升, 后下降的变化过程, 但整个变化过程都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 在竞争框架下, 被试的认知模式基本是稳定的。讨论框架(讨论组)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在作用方向、变化幅度上与其他三组媒体框架有所不同。经充分讨论后, 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显著趋于理性(表现为越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国发起, p 值为 0.01), 但一个月后显著地往实验前的认知水平移动(甚至超过了 T0 时刻的认知程度, p 值为 0.0117), 即该组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国发起, 并且变化幅度比其他三组更明显(T1 时刻的认知均值比 T0 时刻下降了 0.2917, T2 时刻的认知均值比 T1 时刻上升了 0.3542)。

在影响民众经贸安全认知的诸多媒体框架类型中, 讨论框架的影响最为明显。当处于充分讨论的自由舆论环境中时, 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这类复杂性安全议题的认知趋于理性。然而,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 人们恢复到既往舆论信息环境的生活状态, 更多受到来自同质化的官媒信息的影响, 其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甚至超过实验前的认知水平。这表明, 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很可能会受到所处社会的公共舆论氛围的影响, 因而, 给予适当的讨论空间, 可能有助于培育民众温和、理性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另外, 即时的亲中框架信息未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 这或许是因为经长期爱国主义教育所塑造的认知模式是根深蒂固的, 难以为瞬时的亲中框架媒体信息刺激所“撼动”。这意味着, 在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中, 处于深层次的认知模式这一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相比之下, 亲美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甚至一度表现出“逆火”效应。当被试接收到即时的与既有信念体系不一致的信息(如亲美框架信息)时, 可能产生认知上的失调, 进而激活既有的认知图式来消解这部分的异质性信息, 使之与既

^① 这里, 我们将 T2 时刻亲美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作用效果, 视为达到显著影响的边缘(p 值为 0.1188)。

有认知模式保持一致（表现为一个月后，亲美组被试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模式，且达到了统计上显著的边缘）。简言之，上述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被试关于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的影响状况，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在长期且高度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较为稳固。

2. 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

与前类似，在考察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下被试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是否存在差异之前，文章有必要对随机化分组及实验前测（T0时刻）的测量效果进行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媒体框架情境下的被试在阅读实验材料前（即未接受相关媒体框架信息的刺激），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p 值为0.1367）。随机化分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通过考察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具备明显的时间持续特征后发现，亲中框架和竞争框架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策略主张存在显著的影响，且均明显地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亲中框架在T1、T2时刻的 p 值分别为0.019、0.0038；竞争框架在T1、T2时刻的 p 值分别为0.0042、0.0667）。相比之下，亲美和讨论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亲美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尽管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过程，即接触这类信息后，被试关于捍卫国家经贸安全的态度表达趋于温和，但这一前后过程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亲美框架在T1、T2时刻的 p 值分别为0.8014、0.7689）。讨论框架则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并恢复至实验前的态度水平这一变化过程，但这一前后过程同样也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讨论框架在T1、T2时刻的 p 值分别为0.6643、0.6791）。

亲中框架信息出现时，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会表现出强大的框架效应，但不具备持续性（表现为一个月后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显著趋于实验前的水平）。显然，这与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的生成逻辑不同。这表明，相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受众的安全认知与应对态度这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在竞争框架中，亲美框架信息并未能抵消亲中框架信息在塑造经贸安全态度方面的作用。换言之，即使同时阅读亲中与亲美两种竞争性框架信息，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受亲中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更明显，即被试

□ 当代亚太

更可能选择性地吸收符合其既有立场的亲中框架信息，以保持与既有信念体系的一致。此外，在亲美框架和讨论框架下，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趋于温和，但这一过程并不显著。这两组被试的态度较为稳定，且不具备明显地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强化或弱化的持续性。这表明，在舆论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下，即使受众“偶尔”接触到异质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其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也不会显著地受这类信息的影响。

本文对民众维护国家经贸安全的态度的揭示，符合既有研究的结论，即政治态度容易受到单一框架信息的刺激，但不具备明显的持续增强或持续减弱的时间持续性。^① 此外，亲美框架和讨论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受讨论和竞争两种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机制恰好相反。通过比较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的作用逻辑可发现，没有任何属性的媒体框架能同时对认知和态度两个维度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同一媒体框架在不同时段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或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影响，存在作用方向与程度的差异。这反映了，在国家安全观这一系统化思维体系中，认知模式和态度这两个维度的特质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这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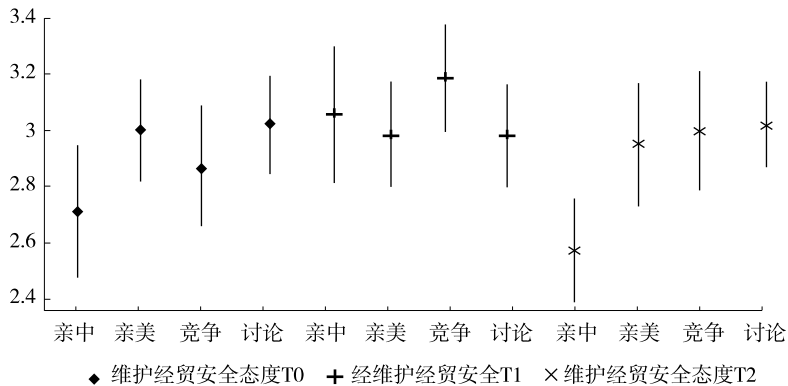


图 4 各组被试在不同时段关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变化状况

说明：纵轴数字表示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 2

^① 陆屹洲、马得勇：《媒体框架效应及其持续性——以中美经贸摩擦为议题的实验研究》，第 50～65 页。

(三) 进一步的解释

表 2 是关于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观在认知模式和态度两个维度影响情况的汇总。一方面,民众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显著地受讨论框架的影响,但未受其他三组框架信息的刺激。另一方面,民众对涉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并未受到亲美框架或讨论框架的显著影响,但在亲中框架和竞争框架的刺激下发生了显著地趋于强势的态度变化。亲中框架与竞争框架均只对受众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没有对认知维度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讨论框架只对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但未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亲美框架对经贸安全认知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两个维度都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表 2 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影响情况汇总

	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		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	
	T1 时刻	T2 时刻	T1 时刻	T2 时刻
亲中框架	0	0	+	-
亲美框架	0	+	0	0
竞争框架	0	0	+	-
讨论框架	-	+	0	0

说明: 0 表示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 表示即时的框架信息对受众的经贸安全认知或维护经贸安全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越认为完全错在美国或越主张对美强硬); - 表示即时的框架信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果 (即越不认为完全错在美国或越不主张对美强硬)。检验方法为配对样本 t 检验

资料来源: 同图 2

在呈现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和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分析结果后,我们将综合运用图式理论、锚定效应和启发法等微观的认知心理机制,结合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这一重要的结构动因,就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和态度主张的影响差异,且这种影响并不具备显著的时间持续性两个基本问题做更深入的理论化解释,以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提供一个能融合舆论环境的制度结构与微观的认知基础

□ 当代亚太

的综合性分析视角。^①

在经贸安全的认知维度，为何亲中框架未对被试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人的认知模式先天存在一定的思维惰性，对逻辑思维（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难度要远大于公众对宣传式话语的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认知模式或政治知识图式。另一方面，与接受科学知识或理性思辨能力训练的西式教育模式相比，中国民众从小便开始接受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一实践过程更为系统，时间更长。因而不难理解，即使受到即时的亲中框架信息的刺激，受众的认知模式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是趋于稳固。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解释竞争框架这类异质性较强的媒体信息为何未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被试选择性地吸收其中的亲中媒体框架信息，以保持与既有信念体系的一致。这表明，长期接受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受众认知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彰显了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对民众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的塑造，取得了明显的正面效果。此外，与人们受到亲中框架信息的刺激或长期处于国内这种舆论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信息环境中的反应不同，提供即时的讨论框架信息，会瞬时对被试的认知模式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一个月后又明显地往最初测试（T0时刻）的认知水平方向移动（即被试愈倾向于认为责任完全在美方）。与亲美框架和竞争框架不同，自由讨论的舆论环境不仅提供异质性信息，还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环境，进而更可能挑战被试既有的认知习惯或图式，使其变得“短暂”理性。不过，为了缓和这种自由讨论带来的认知失调，被试会启动心理防御机制，进而使其认知模式恢复至原有的认知水平。这表明，如果缺乏自由讨论空间的刺激，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理性认知能力可能会受到削弱。由此不难做出的推论是，如能提供自由讨论的舆论氛围，这对培育更加符合大国民素养的理性认知能力大有裨益，从而为今后更有效地应对更加激烈、不确定的国际竞争局势提供必要的“软”实力。总体而言，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受众的认知模式较为稳定，单一的同质化或异

^① 本文并不止于提供微观心理因素的解释，而是考虑将微观认知因素与宏观制度环境动因结合起来，以尝试跳出既有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解释割裂的困局，以更加综合性的视野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具体政治观念的生成及演变逻辑。这一思路受著名政治学者斯坦默的启发。参见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Vol. 44, No. 5, 2021, pp. 1140-1159.

质性信息，并不足以显著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同时还需提供自由讨论的舆论氛围，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但这种即时的刺激效果不具备显著的时间持续性，这总体上与当前同质化的舆论现状相符合。

在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方面，亲中框架和竞争框架会表现出即时的正向刺激效应，但不具有持续性，一个月之后这种效果逐渐消失（表现为这两组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显著地趋于缓和，朝 T0 时刻的态度方向移动）。这同样反映了，在长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学生关于如何维护国家经贸安全的态度或信念更容易受到国内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的塑造，即使暂时接收到竞争框架这类兼具异质性观点的信息，也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有的态度，而是选择性地接收、理解其中的信息内容。事实上，这还是政治知识图式在发挥作用，被试通过熟悉的或与既有信念体系一致的知识图式来“调动”其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运用启发式等思维捷径来处理信息，进而与爱国主义信念体系保持一致，即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议题上，倾向于主张采取强硬的政策立场。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缺乏相应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的持续刺激，被试的态度反应逐渐“冷却”下来，以更好地适应于常态化的舆论信息环境。相比之下，亲美框架或讨论框架信息未能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产生明显的影响。这进一步显示，由于长期接受同质化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异质性更强的媒体框架信息在短时间内难以对被试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公共舆论环境，对启发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适当地通过自由讨论的舆论氛围以开启民智，塑造民众的理性认知和温和的态度立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安全教育实践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结论

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复杂的经贸安全议题为实验背景，考察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人们关于经贸安全事务的事实认知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的影响，进而揭示在中国特殊的信息舆论氛围下，民众国家安全观形成及变化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一是揭示了不同媒体信息

□ 当代亚太

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刺激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当受众在接触到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时,其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的影响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别。相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的经贸安全事实认知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往往也存在区别。二是同一媒体框架信息对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影响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性,即一段时间后,特定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与态度的刺激效果可能会恢复到实验前的水平,或发生了并不显著地移动。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民众认知和态度两个维度的作用逻辑不尽相同,因而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内外关于影响一般政治态度的已有结论,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特殊信念体系的生成逻辑。这或许启示人们,需对导致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和态度出现差异背后更深层次的个体内在认知局限等心理因素,以及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结构因素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本文从事实认知和态度立场两个维度对民众国家安全观做了划分,并对媒体框架信息影响民众国家安全观的机理做了初步的探索性分析。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否定从国家行为体、政党组织等宏观层面讨论国家安全观的意义,而是尝试从特定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视角出发,揭示普通民众的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把“人民”的视角带回国家安全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国家安全工作原则,表明深入了解普通民众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和信念体系,是制定更加科学、更具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在信息海量增长、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从媒体框架视角考察型塑民众国家安全观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为官媒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特殊的舆论政策提供合法性论证,同时能为今后相关实践工作的改进提供政策上的启示。另外,就研究设计思路与方法而言,本文运用实验室实验和追踪调查的研究方法,为民众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媒体框架效应机制提供了探索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尝试为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设计思路,希望有助于拓宽国家安全观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空间。

(二) 讨论与展望

在信息无处不在的网络时代,媒体框架信息似乎形成了对民众的“合围”,人们对外界局势的判断及应对,离不开所掌握的信息。国家安全观根本上呈现的是个体层面的观念体系,但并非个体安全观念的简单相加,因

而,需运用复杂系统思维来融合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认知基础,进而考察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型塑逻辑。心理机制是了解民众政治态度和行为的一项必要条件,是个体政治态度形成的心理根源。^①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是怎么形成的?其内在的心理特质与舆论监管的宏观制度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即使是在同样的体制下,并非每个人都受同一框架效应的影响,也不是每个人受同一框架的影响程度都是相同的。这表明,今后的研究需更多关注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微观心理机制。

未来相关研究可从国家安全基础理论议题和教育宣传政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在理论上,后续的研究工作可围绕以下两项议题进行拓展:一是探讨不同群体的国家安全观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即不同群体在接触相应的媒体框架信息后,其国家安全观会呈现怎样的状况及差异?导致这些差异背后的心理机制及社会结构动因又是什么?本文仅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做初步的探索性分析,并没有直接对国家安全观型塑、演变的心理机制(如人格特质、意识形态立场等微观心理变量)做系统性分析,这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进一步讨论。二是比较不同文化思维模式和政治体制下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差异。具体而言,媒体监管制度对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作用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权力运行逻辑有所不同,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受社会舆论的约束更大,因而其国家安全战略在制定过程中更具民粹化色彩,而民主集中制则通过调研、座谈等形式或过程,形成相应的决策模式,更具精确性和针对性。不同体制对人的思维模式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这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进而与既有从宏观的国家行为体视角考察不同思维模式下国家安全观差异的研究展开更充分的对话。

在政策实践上,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思考:一是针对民众的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应以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及变化的机理为基础,未来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全民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实践,需充分尊重和主动掌握媒体信息影响受众认知模式和政治态度的普遍心理规律,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落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政策,以提高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

^① 马得勇:《“匹配效应”:政治谣言的心理及意识形态根源》,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54~66页。

□ 当代亚太

事务的认知能力，塑造更理性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态度。二是国家对外安全战略应对层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大国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宣传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更好地把握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生成及演变逻辑并更有效地应对之，以实现更积极的战略对话，避免误判与冲突十分重要。人的认知往往受到特定媒介渠道信息的影响，权力秩序在知识分布、观念变迁过程中演变，而权力格局的重组往往受媒介技术更新的影响。^①为此，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的信息化时代，我们需要在了解特定的舆论制度环境及其与人的认知心理机制互动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未来一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发展态势和动向。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适合维持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什么样的情境下更适合提供能自由讨论的、开放的舆论信息环境？推动这两种舆论环境相互转换的动力机制、节点是什么？对这类问题的掌握或许关系到未来国际安全战略竞争的成效。

当然，对全民展开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与大国对外安全战略应对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割裂的，而是需要更有效地融合。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年一代（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群体），接受长达几十年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他们的观念认知模式根深蒂固，这是过去几十年政府宣传与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随着代际的变化，这批青年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对各领域的政策议程设置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无疑与个体内在的认知模式和信念体系有很大关系。然而，面对更加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一个什么样的舆论环境才能提升民众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更加成熟、理性的大国公民姿态去适应未来更加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竞争局势，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① 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country occupies on the value chain is impacted by many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domestic policy choice. Policy choices available to states vary widely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impose export requirements and promote indigenous productive capacities. Largely, these factors determine a state's place on the value chai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factors behind these policy differences. Considering th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faced by ruler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extending selectorate theory to industry-level policy making. It conducts a “most similar”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selecting the automobile industries of Malay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centives for political survival determine whether policy goals are oriented towards “rent-seeking” or “income-generation”.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achievement of a specific policy goal determines policy choice; that is, whether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with respect to meeting export requirements and (or) developing indigenous productive capacity. This paper helps to fill in gaps in the research on value chains by considering the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not normal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political factors when assessing investment risk and engaging in industrial policy debates.

Key Wor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 Value Chai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orate Theory; Automotive Industry

About the Authors: Qin Beichen is a 2021 PhD Student a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Shi Youwei is a 2021 PhD Student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Media Framing Effects on Public Views of State Security: An Experiment of Economic Security Issue

Hou Weig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case of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an entr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characterized by booming information—shapes public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with respect to a critical state security concern. Using an experimental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ffect the views and responses of the Chinese public vis-à-vis economic security. By deploying a panel study, the article further assesses the durability of framing effects. This article looks particularly the extent to which media frames are pro-Chinese or pro-American, and designs four hypothetical media frames: a pro-China frame, a pro-U. S. frame, a frame of competition, and a frame of open discus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China, competitive or open discussion frames impact views of economic

security only along a single dimension. This is to say that these frames have clear impact only with respect to either attitudes or cognitions. Only pro-American frame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ort on either the cognitive or attitudinal dimension. This illustrates that public cognitions and attitudes with respect to security are relatively stable over long-term processes of political-socialization, and that they further adapt to homogenous publ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differences across the various frames by considering media oversight and micro-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Finally, it considers a modality for understanding a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vis-à-vis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on, while also discussing how to carry out public education on state security.

Key Words: Media Frames; Views on Economic Security; Cognitive Dimensions; Attitudinal Dimensions; Experiment

About the Author: Hou Weigang is a 2020 Ph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 System Evolution and Hegemonic Chang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 Haixia and Sun Zhaorui

Abstract: Does power transition come with large-scale war? Reviewing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hegemonic transi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ffers a number of new ideas. Drawing on explanations from theories of system evolution and normative change, this article makes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whether or not power transition is accompanied by large-scale war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dynamics caused by the power gap between the rising state and the hegemon, but also on whether the rising state adopts a deferential or aggressive approach to power. In the case of the rise of the Kingdom of Qi, the initial hegemon may opt to pay respect to Zhou, however in accepting the hegemon's status, the Emperor of Zhou may also weaken his legitimacy, which in turn result in a deterioration of norms, and in turn result in major state's adopting a more aggressive path to its rise. This will result in a greater risk of war.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wo models of three-player evolutionary games: one involving the Emperor of Zhou, the rising state and the hegemon; and a second evolutionary game involving the Emperor of Zhou, the hegemon, and the other states with allegiance to the hegemon.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 of the games confirms the above hypothesi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es the paths to hegemony taken by the Duke Huan of Qi, Duke Wen of Jin, Duke Mu of Qin, and King Zhuang of Chu. This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argument